

象征资本之争：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战

郑周林^{1,2} 黄勤¹

(1.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湖南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在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的场域里，两人主要围绕“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展开论辩。双方所较量的不仅关涉语言规范问题，更突出的是，参与者藉翻译之名，争夺文艺思想的合法性，亦即翻译社会学意义上的象征资本。

关键词：翻译论战；翻译社会学；翻译场域；译者惯习；象征资本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2-0108-05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纷繁复杂的翻译论战，主将分别为鲁迅与梁实秋。两人的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上一桩有名的公案。对于这一论战，学者时有评述，视角颇丰。譬如，董炳月指出这场论争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1]。王宏志将翻译与阶级性联系起来，凸显论战所隐含的“翻译就是政治”的实质^{[2](P333)}。诸类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这场论战，但对于论战所体现的社会维度，他们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本文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论为基础，借助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赋予这场论战新的阐释。

一、翻译社会学识解

根植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翻译社会学，是一种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其理论模式的建构，与对“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三个核心概念及相互关系的论述是紧密相关的。在《区隔》(Distinction)一书中，布迪厄扼要地提出了如下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3](P101)}。简而言之，实践者行为是资本与惯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社会学的概念框架

场域并非具体的物理存在，而是一个便于理解社会关系而创造的概念。作为客观结构，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规律”^{[4](P162)}。在这种自主的空间里，参与者为了积累、垄断不同的资本类型而展开斗争，并进行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的生产、流通与挪用。惯习研究的是社会客观结构与参与者行为的关系，被界定为“构成体系的定势”^{[5](P18)}。它强调个体行为的群体性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参与者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实施某些有规可循的行为。相较而言，场域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而惯习是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行。在布迪厄的理论里，资本扩展到了所有的权力形式，既有物质的、文化的，也有社会和符号的。它研究个体与群体以何种条件及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6](P75)}。

(二) 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模式

实践理论既要求构建相关场域，也要求构建实践者的惯习。对于方法论问题，布迪厄指出，对知识与艺术作品的研究路径包括如下步骤：(1)必

收稿日期：2017-01-07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解构主义视域下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12WYLH32)

作者简介：郑周林(1979-)，男，湖南耒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黄勤(1966-)，女，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须将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2)必须辨识个体与群体在争夺艺术的合法化时所占据的对抗性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3)分析行事者在相应位置时的惯习以及他们在这场域斗争中追随的社会轨迹^{[7] (P104-105)}。

依上所见,对实践的分析涵盖构建实践发生的场域、资本以及行事者的惯习。对于翻译场域运作的考察,就是要重构翻译场域的内在结构及其与他者场域的联系,着重分析译者惯习与资本的运作特点。具体来说,可将翻译场域视为翻译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相对独立的关系网络,对它的分析要与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场域结合起来。对于资本的探索,则要辨识场域中特有的资本形式及其配置方式,尤其要考察象征资本得以实现的策略。对于具体的翻译事件,我们得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模式,转向借助这种社会分析路径。对于场域的运作,“既考虑到个体的社会因素,也兼顾了社会中的个体因素”^[8]。

二、鲁梁翻译论战的场域重构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在文化场域中,两人的成就各有千秋。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两者在论战时的场域占据不同位置,所享有的象征资本不均。论战伊始,鲁迅已为文坛宿将。梁实秋时年方24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虽在文坛崭露头角,但比起鲁迅,仍难以望其项背。文化场域的资源配置毕竟有限,暂居落后的行事者,要么否定前人、推陈出新,要么等待社会的老化并予以替代。在充满斗争的文化场域,梁实秋选择了否定鲁迅,扮演起挑战者的角色。梁实秋在1929年9月10日的《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过了几个月,作为对两文的回应,鲁迅在《萌芽》月刊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翻译论争由此酣战淋漓。而后,陆续有赵景深、瞿秋白、叶公超等人卷入其中。除了上述的两个问题,双方还在其他方面展开了论争,诸如批评的态度、文人之行、重(复)译以及“第三种人”。

现在我们重构这场论战里翻译场域与相关场域的联系。场域间的联系,反映在两人所追随的社会轨迹中各种规则的互动上。以梁实秋来说,他将易读作为依归,说“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9] (P193)}。这种追求“顺畅”的惯习,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在清华学校以

及美国接受过多年的英语教育有关,这些早期的文化资本积累为他转换象征资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翻译思想的形成,与他在文学场域里内化的惯习也是分不开的,哈佛的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 Babbitt)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用梁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10] (P3)}。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9] (P453)},用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悲剧《马克白》。他选择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很好地诠释了“人性论”对他的影响。他秉持的这种立场,其中心就是“人性”论,给他的翻译观赋予了象征资本,也成为他迎战鲁迅的重要资本筹码。

对于鲁迅来说,他在不同时期秉持的翻译思想也留下了与场域中的规则互动的轨迹。根据翻译思想和方法的变迁,他的翻译活动分为早期(1903-1908)、中期(1909-1926)和后期(1927-1936)^{[11] (P97)}。早期以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译介为主,体现了他对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的追随,而对科学小说的译介则契合了彼时权力场域对“实业救国”的提倡。到了中期,随着对林译小说中误译的不满,他有意远离过度“意译”、大幅增删的惯习,开始趋向直译。因为当时有译者如吴棣、马君武、曾朴等人追求忠实的译文,他的直译惯习并不显得突兀。以兄弟两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起点,鲁迅逐渐关注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未能熟练掌握英文这一重要的象征资本,则使他成为梁实秋暗讽的对象:“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9] (P11)}。到了后期,鲁迅痛感文学场域里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内部斗争中所积累的象征资本(具体来说,就是理论修养)不足,于是将目光转向翻译场域,主动阅读、翻译了不少苏俄的文学理论。对这些理论的译介,构成了他在文学场域里与论敌交锋的重要象征资本。

三、译者惯习交锋与资本争夺

鉴于这场论战的复杂性,下文侧重两个主旨问题:一是“硬译”问题,可以说是语言层面的交锋;二是文学的阶级性与普遍的人性问题,涉及思想倾向的冲突。

(一)语言规范的交锋

在翻译社会学的观念里,惯习是对场域规则的内化,在参与者的行为上有所体现。在微观方面,译者惯习影响的是翻译策略、措辞等方面的考量;在宏观方面,它影响的是译者对文本题材、思

想观念等方面的选择。“硬译”问题的碰撞实质上反映了译者惯习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层面的交锋,具体来说,关乎语言的规范问题。梁实秋尖锐地批评鲁迅的硬译,立论的关键词是“死译”与“曲译”,实际上是对鲁迅的译者惯习作了定性。他列举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的三处作为“死译”的例证,并借用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里的“硬译”一说,严正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91] (P192)}。这样将“硬译”与“死译”相提并论,很明显是否定鲁迅译文的不可取。这是从翻译技巧的层次来批评鲁迅的译文,是对译者惯习微观层面的否定。

两人携带的惯习以及资本投资的策略对他们争夺象征资本产生了影响。一般而言,象征资本不是经由继承而来,而是获得认可而来^[12]。也就是说,象征资本的合法性要得到其他参与者的认可才能实现。涉及“硬译”话题的时候,鲁迅处于象征资本争夺的劣势处境,这一状况鲁迅研究名家孙郁就看得很清楚:“30年代的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指鲁迅)的译风”^{[13] (P87)}。鲁的“硬译”说辞遭到了论敌的猛烈抨击和朋友的善意劝告,甚至他自己都认识到“硬译”惯习的缺点。梁实秋的论断不无道理,诚如他所言:“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9] (P190)}。他继而批评鲁的“硬译”离死译不远了。在写给叶公超的信里,梁实秋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指出鲁迅所译《艺术论》“系根据日译本转译的,日译本虽然许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达尔文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9] (P601)}。他将鲁迅的译文与英语原文作了一番比较,充分利用了他精通英语的这个文化资本,旨在论证鲁迅翻译惯习的不合时宜。

由于“硬译”惯习与“曲译”摆脱不了干系,“硬译”的符号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那么在翻译场域中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叶公超就曾表态:“鲁迅的译法,我也‘硬着头皮’读了几遍,觉得非但不懂,而且看不出‘不顺’在哪里,想想也只好与梁实秋站在一边”^{[14] (P27)}。在翻译场域里,鲁迅的译者惯习在以留学英美为主的“新月”派学人中未能获得认可,更遑论象征资本的攫取。吊诡的是,梁实秋与叶公超对鲁迅在文学场域的创作惯习却是持有赞誉的看法。比如,叶公超就曾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

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像Swift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力的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15]。叶的上述两种殊异的想法,给我们观察鲁迅的资本争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在文学场域所享有的象征资本并未如期在翻译场域的象征资本争夺中得以转化。

对于身处不利的状况,鲁迅并非消极应对。在辩驳性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他作了正面的回应,重申和自我批评了一番“硬译”。在他的意识里,所谓“硬译”只是直译的缺陷,这就消解了梁实秋借“硬译”以及“死译”而作的指摘,使得梁在象征资本上并无多少可取。在给瞿秋白的信里,虽然鲁迅表达了对赵景深攻击自己译文的不屑,但他对瞿指出的问题还是作了辩解。瞿秋白的主张很明确,要求翻译“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16] (P381)};而对严复译作的翻印,他评论道:“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16] (P381)}。对于这一说法,鲁迅没有接受,他指出严复“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16] (P390)}。他的如上评论,一则是为严复叫屈,另则是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的直译寻找合法性理据。他将读者粗略地分了三类,将翻译的读者群主要定位在“有很受了教育的人”,主张“宁信而不顺”^{[16] (P391)}。他正视了读者的区隔问题,虽然显示了精英主义立场,但却是情有可原的。当时的语境是,他的译书偏于文艺理论,所要争取的是那些想要透过译作来提高理论素养的作家同人。然而,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他将本可在翻译场域里接受影响的人推向了其他文化子场域,缩小了翻译传播的受众面,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在翻译场域的象征资本,使其远输于他在文学场域所获得的相应资本。在文学语言场域中,他并不在意几个字或者几个词的得失,他着重的是要打破汉语文学的陈规,因为在他看来,“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16] (P392)}。这说明,文学场域内化的惯习,在移植到翻译场域的过程中,并未被鲁迅悉数接受,他对即成的惯习作了取舍,又反过来对文学场域的惯习产生了影响,为文学场域引入异质的语言成分做出了贡献。当然,对这个翻译思想的执著,也影响了译作的接受度,其结果便是“大多数被后来的译本取代,鲁译基本上从日常阅读中退出”^{[17] (P249)}。

(二) 思想倾向的冲突

因人性与阶级性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反映了鲁梁二人文艺惯习的差异,也是象征资本争夺的着力点。翻译这个受限的场域是一个高度专业的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何为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标准而斗争。从本质上看,“他们的翻译论争,与其说是对硬译的论争,倒不如说是对硬译对象——无产阶级文学及理论著作的论争”^{[18] (P83)}。如果说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文中还只是就翻译标准与质量来批判鲁迅的译者惯习,那么《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就直接表达了梁的文艺思想——文学并无阶级之别,那么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就不能成立。这反映了他在思想与文学趣味上与鲁迅的区隔与分化。鲁迅意在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梁实秋则从自己的古典主义立场出发,挑战鲁迅的这一文艺惯习。梁实秋选择性地将鲁迅翻译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斥之为“硬译”,表面上是透过翻译方法上的惯习问题作学理上的探讨,但其目的是要批判译作中的思想。他的做法委实可疑,因为有“硬译”惯习的译者并非鲁迅一人。梁的“新月社”同人徐志摩就有类似的情况,在此论战之前发表的部分译作,其实与鲁迅的翻译作品一样“硬”,有的甚至比鲁迅译作还要“硬”上几分^{[19] (P351)}。对于这种持双重标准的动因,恐怕还得回到梁实秋的立场上去,那就是:他欣赏徐志摩的翻译题材,而对鲁迅的思想倾向不予认同。在他看来,鲁迅所译的理论“错误在于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9] (P237)}。实际上他否定鲁迅翻译惯习的思想倾向。不知何故,鲁迅没有指出梁的这一双重标准,无论是在回击性文章里,还是写给朋友的信中,都坚持文学的阶级性,并继续翻译苏俄文艺理论作品。

在与鲁迅争夺权力话语时,梁实秋采用的策略与他抨击鲁迅译作“硬译”的手法如出一辙,即采取双重标准。他声称:“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9] (P191)}。对于梁文里所指的“风格”一说,鲁迅对所藏的双关语义洞若观火,洞察梁实秋意在借助“硬译”的说辞来贬低鲁迅的翻译选材。这种借谈“硬译”实则言他的策略,梁实秋后来又重新施展。在《所谓的“文艺政策”者》里,他先是就“硬译”的问题议论了一番,而后又说“硬译的成绩我们瞻仰过了,请进而论文艺政策本身”^{[9] (P237)},将

话题引向到鲁迅翻译选材的政治倾向,实际上将鲁迅的翻译归属到政治的禁忌,从而置鲁迅于危险境地。因政治倾向而招致的迫害随时都会发生。事实上,“新月派”主办的《新月》月刊就因宣传自由观念在1933年受到查封而走向终结。实践上的策略,梁除了翻译中意的作品,他也翻译马克思的作品,《莎士比亚论金钱》即为明证。他这样做,并非要帮助对方阵营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思想,而是要利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达到“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效果。在译文后的《编者案》里,他发挥说莎士比亚“其伟大处之一即是他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阶级”^{[9] (P631)},否定了鲁迅这一阵营说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说法,从而为自己的主张寻找象征合法性找到了反证。

对于梁实秋的观点,鲁迅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的一些回击文章里,在学理的层面上,他回答了关于文学是否具备阶级性、文学与宣传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在辩驳文学有无阶级性之后,他对自己缘何要“硬译”难懂的理论“天书”作了回答:“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16] (P213)},表明他要通过翻译在这些人身上进行文化投资,从而获取象征资本,也就说获得他们的认可。尽管他认识到自己不谙俄文,即缺乏翻译所需的象征资本,但面对少有人直接从原著着手翻译的现实,他选择了从日文转译苏俄文艺理论和小说的做法,表达他的志向,即借助自己所积累的象征资本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苏俄文艺的译介。这与他一贯坚持借助翻译启迪民智、改造知识分子的志向是分不开的。他在译介材料上的投资,使他在文学观念汲取了新的营养,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他选择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积累了象征资本,其巅峰就是他成为左联的旗手。他竭力维护自己的观点,也逐渐改变了梁实秋的看法。在《人性与阶级性》等文中,梁已经同意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与他在论战初期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了。以此来看,鲁迅的一些观点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鲁迅所持象征资本的合法性得以实现。

(三) 论战的影响

对于文化场域中双方所据的位置结构,这场论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彼时,各方都聚集了支持者,鲁迅这一方的代表是瞿秋白:“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绝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绝不是广告!”^{[20] (P335)}而被划入梁实秋阵营的赵

景深,只因评议鲁迅译作的“硬译”问题,其主张的精义就被说成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16] (P350)},遭遇权力场域的符号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困境。当论争烟消云散,一切并未归于尘埃,权力场域仍然对鲁迅与梁实秋这两个直接参与者的位置施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鲁迅所赐“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标签,梁实秋多年不为大陆文化场域接受,其费尽心血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是在两岸正常交流后方为读者熟知,而其思想在译论场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陈福康的《中国译学史》、罗新璋与陈应年的《翻译论集》等几部史集里,梁实秋论述翻译的篇章鲜有收录。而鲁迅的译论,在上述的史集里则都有刊载。两者在译论场域的地位天壤之别,诚为憾事。

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超越单纯文本分析的范式转向。它探讨翻译的社会语境化问题,重视翻译的社会属性,为我们深刻理解二十世纪那场翻译论争提供了很好的启示。置身当下的文化场域,我们要跳出片面的思维定势,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那场思想的碰撞:既不能因为鲁迅占据了有利地位就无视他的不足,也不能因为梁实秋处于鲁迅的对立面,就否定他在彼时文化场域所作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董炳月.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J].鲁迅研究月刊,2008,(11).
- [2]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 Ibi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5] Ibid. *Sociology in Question* [M]. London UK, Thousand Oaks USA & New Delhi India: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6] Swartz, David.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7] Bourdieu, Pierre and Loi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8] 覃江华.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翻译与社会导论》叙介[J].上海翻译,2015,(1).
- [9] 黎照.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 [10] 梁实秋、侯健.关于白璧德大师[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7.
- [11] 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 [12] Gouanvic, Jean-Marc. “A Bourdieu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J]. *The Translator*, 2005, (2).
- [13] 孙郁.鲁迅与现代中国[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 [14] 房向东.鲁迅是非[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 [15] 叶公超.关于非战士的鲁迅[N].益世报,1936-11-01.
-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7] 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8] 胡翠娥,李云鹤.殊途不同归:鲁迅与梁实秋翻译思想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4).
- [19] 王友贵.翻译东方与西方:中国六位翻译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 [20]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责任编辑:冯济平

Struggle for Symbolic Capital: Debate on Transl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

ZHENG Zhou-lin^{1,2} HUANG Qin¹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debate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 is a much discussed issue. Concerning the field of struggle, the debate revolved around arguing over "rigid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 nature of literature". What they contented to acquire was not only the language conform in terms of habitus, but also the more important legislative status of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name of translation, i.e. the symbolic capital in a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ense. Judging from the result, Lu Xun's performance of language in translation was not well acknowledged, while th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thought in it was partly recognized by his opponent.

Key words: translation debat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field; translator habitus; symbolic capital